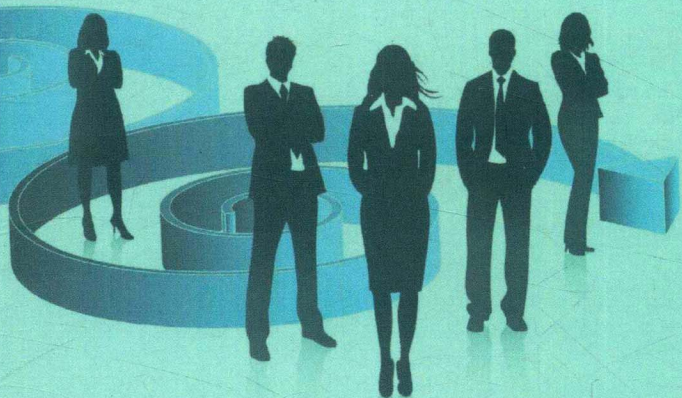


超大城市社会转型时期的 职业结构与职业获得

王嘉顺◎著



中国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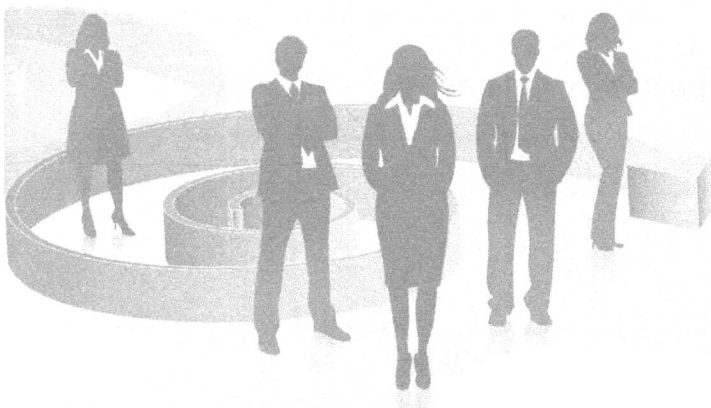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本书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YJC840038)、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项目编号:JA13032S)、华侨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费项目(项目编号:13SKBS107)的资助。

超大城市社会转型时期的 职业结构与职业获得

王嘉顺◎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大城市社会转型时期的职业结构与职业获得 / 王
嘉顺著. — 广州 :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5.5
ISBN 978-7-5100-9647-1

I. ①超… II. ①王… III. ①特大城市 - 职业 - 研究
IV. ①C9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9242 号

超大城市社会转型时期的职业结构与职业获得

责任编辑 黄利军

封面设计 高 燕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37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9647-1/F · 0191

定 价 43.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1
第二节 研究意义	3
第三节 研究回顾	5
第四节 研究设计	26
第二章 制度变迁与职业分布	34
第一节 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的特征	34
第二节 我国劳动就业制度及其变迁	40
第三节 社会转型时期的职业结构	46
第三章 社会转型时期的职业结构及其变迁	57
第一节 总体职业结构及其变迁	57
第二节 职业结构的代际变迁	70
第三节 社会转型时期现职获得的初步分析	79
第四章 外来人口的职业结构与职业获得	91
第一节 外来人口职业结构的变迁	91
第二节 两类外来人口的职业分布及其差别	95

第三节 职业获得中的户籍因素 101

第四节 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 113

第五节 外来人口的市民化 129

第五章 职业获得分析:种类、价值与性质 140

第一节 职业种类的获得:综合的视角 140

第二节 职业价值的获得:社会经济地位的视角 150

第三节 职业性质的获得:体制分割的视角 160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169

第一节 结 论 169

第二节 讨 论 174

第三节 研究评价与研究展望 178

参考文献 181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1978年开始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些体制、制度、方式上的变迁意味着传统的中国社会正向现代社会过渡，这样一种交替的社会形态可称之为社会转型。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转型也是一种社会变迁，而中国的社会转型除了具有社会变迁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一些新特点。社会变迁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而社会结构的变迁无疑是其核心所在。社会成员从自身所处的社会位置向其他社会位置移动将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从而使整体社会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条件。由此可见，社会成员在不同社会位置间的流动既受到已有社会结构的影响，而且它本身也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社会流动呈现出何种新变化和新特点是学者们的关注所在。由社会流动所引申出的更具体的研究包含了流动方向、流动速率、流动的时空范围、流动模式、流动途径、流动机制等。根据经典研究中的定义，社会流动是“一个人或者社会目的物或价值——由于人类活动所创造或改变的任何东西——由一个社会地位到另一个社会地位的任何变迁”（Sokorin, 1959）。此后，学者们一般将社会流动的个体限定于社会成员个体或者社会群体，而流动的落脚点则是社会位置。布劳认为社会位置就是社会成员的属性，“一个位置指一种由某个单独参数界定的地位或群体成员资格”（布劳，1991）。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政治（权力）、声望构成了三个主要社会位置的坐标轴，



社会成员或者在其中一个，或者在多于一个的维度中占据自己的社会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单就社会分层的意义而论，社会成员拥有这个位置上所负载的社会资源，而当他流动到新的位置时，得到的社会资源会重新配置。这些社会资源相对于数量众多的社会成员来说往往较为稀缺，而且除了有形的社会资源之外，那些无形的社会资源其社会价值更大，它可以为社会个体赢得额外的利益。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职业的经济收益要比其他职业的多，某些职业的权力要比其他职业的大，而某些职业的社会声望要比其他职业的高，职业成为一个承载众多社会资源的平台，获得了某类职业也就意味着获得了该职业所赋予的相关社会资源。因此，职业不再是一个社会分工的设置，它也是一个为社会成员提供流动机会的途径。此外，职业在面向社会个体的同时，它也将个体和更大的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职业也是一种中介，是我们研究个体的社会流动和整体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着眼点。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当社会个体的职业变换时，他的社会地位一般也会相应改变，由此发生社会流动；而从社会整体角度来看，当改变职业的个体增多时，社会地位的交换和替换也会增多，社会结构由此发生变迁，而社会结构的变迁也会影响个体的职业获得。

我们考察个体的职业获得或者职业流动时，考虑的因素往往有两个，一个是个体性因素，另一个是结构性因素。个体性因素包括个人的能力、经验、教育水平、家庭背景等，结构性因素往往涉及制度层面。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无论是个体获得第一份工作还是换工作，首先要有这样一个工作并且空缺，然后那些具备该工作要求的求职者通过各种方式最终获得该工作。因此对于那些求职者而言，这些工作正像预先设定的机会一样，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抓住这些机会。基本上可以看出，首先，机会是由工作单位提供的，但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机会的产生受到一些制度性的影响，不同的制度带来的机会以及获得机会的方式和可能性都不一样。其次，在机会被提供了之后，只有那些有能力的、符合要求的、擅于抓住机会的人才能得到。从机会产生和获得的角度来看，个体的职业获得或者职业流动，就是寻找并抓住职业机会的过程。

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很多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变革基本上是以制度或体制上的变迁为先导的，而这些变迁极大地影响了个体的职业获得，进而影响了社会流动。以改革为特征的社会转型正经历着三个人类社会重大的转变



型态：市场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这三个正在进行中的转变过程既具有人类社会的一般特征，也具有中国特色。通过制度变迁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化改革意味着通过市场来解决社会和经济等问题，它是相对于计划而言的一种手段；现代化的含义较为丰富，但是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它意味着工业化，也就是在经济活动中，工业生产活动取代传统的农业生产活动，成为社会主要的生产活动方式；城市化在最直观的含义上表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这也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但是由于中国的独特国情，它的表现特征及其产生的影响需要被单独考虑。

本书是一个社会流动研究，是从职业获得这一角度入手的。由于中国的制度改革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的调控，而职业机会又受到这些改革的影响，因此对于个体职业获得的考察少不了来自制度的视角。在上述的铺垫下，本书研究的问题是：社会转型对职业获得的影响。关于此问题，需要进一步廓清。首先，在研究的时间范围上，始于1978年，考察的截止年份受到经验材料的限制，止于2005年。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一个为了便于考察而设定的时间区间。其次，本研究的经验材料来自广州市，而不是全国的样本，考察的对象则是广州行政区划内的在业人口^①，而不管其户口性质和户口登记状况。至于如此选择的原因我将在研究设计部分具体说明。最后，社会转型对职业获得的影响在本书中意味着社会转型所伴随的上述三个主要制度性的变迁对职业获得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1978—2005年期间职业结构和职业获得模式的变化中得到体现。

第二节 研究意义

一、学术意义

研究意义意味着本研究的价值，是区别于其他研究的特色所在，它主要包括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两个方面。关于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相关

^① 本书对样本中的在业人口作了年龄上的限定，分析样本要比实际在业人口数量少，具体见研究设计部分。



领域的热点,正如下文将要总结的那样,这些研究在社会流动理论、研究方法、分析工具以及社会调查方面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同这些已有的理论和研究相比,本书将在学术方面获得一些新的发现,争取有所突破。关于学术意义,我将谈及研究视角、研究内容、数据资料三个方面。

首先,大部分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都着眼于个体流动,对于影响流动的因素主要考察个体性特征或家庭背景,而即使在新结构主义引入社会流动研究之后,由于中西方社会的差异,这些有力的理论分析工具仍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而无论是作为一种修正还是一个新的理论分析工具的提出,新制度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上的解释看起来都有点似是而非。同西方发达社会不同,中国现代社会^①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制度变迁和频繁的政治运动,而这些事件的后果涉及全局性。因此对于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不能忽视国家的作用,国家正是通过这些制度、政策甚至是政治运动影响社会个体的职业获得进而影响他们的社会流动。本研究的重点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段转型时期内的职业结构变迁背景下的职业获得模式,但是作为根本性的影响因素,笔者将简要结合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之间流动模式的变迁,分析国家制度对个体职业获得的影响。

其次,在研究内容方面,将考察群体职业结构和个体职业获得模式的现状及变迁。社会流动研究的分析单位基本上都是个人,另外还有少量是家庭,社会群体虽然自社会流动研究发端就在其考察之列,但是真正把群体作为考察对象的研究很少。在本研究中,笔者将结合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代”,在其基本的意义上,考察同期群(cohort)的职业结构的变迁,力图通过群体和个体两个角度观察转型时期职业获得及其变迁情况。

最后,结合上述的研究内容,争取在数据资料的使用上有所创新。本研究使用的分析数据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人口普查、抽查的原始数据。这些数据受到变量指标较少的限制在以往社会流动研究中使用得较少,但是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内容较为丰富,基本可以满足职业获得的研究需要。此外,在引入“代”的概念之后,可以使用历次的人口调查数据进行同期群研究,分析他们在不同时期的职业结构与职业获得的情况,从而寻找出变化的趋势,这在以往关

① 这里仅表示历史时间意义上的“现代”,而非社会形态上的“现代”。



于社会流动的研究中较为少见。作者期望通过此次研究,尝试发掘人口数据的信息潜力,为使用人口数据进行社会流动研究提供一种尝试。

二、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和群体在社会位置上的调整,而职业则是最终的落脚点。对于职业获得的研究,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在做出有关调整各阶层群众利益格局的政策时有基本的参考。第二,职业机会受制度、结构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很大,不同的社会群体因此具有不同的职业预期机会,而通过相关的研究可以获得一些启示,国家和地方在制定政策,特别是就业政策时,应尽量实现社会公平。第三,职业是联系个体和社会结构的结点,关于职业结构变迁的研究也可以反映社会转型时期产业化发展的现状,对比反应一系列改革特别是产业改革的效果,为制定后续产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第三节 研究回顾

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流动又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要议题之一,从索罗金开启对社会流动的学术研究之后,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学者探讨了包括流动及与其相关的各种议题。因此本节内容的安排是围绕本研究的问题展开的,主要整理及评述与职业流动、职业获得、职业机会有关的内容,但是会适当涉及其他有关社会流动的研究。相关研究文献呈现的顺序将按照西方经典研究、中国社会的研究来展开,这样一个顺序也反映了社会流动研究的发展过程。

一、西方经典研究

(一) 研究的开启

西方社会学界基本认同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itirim A. Sorokin)开启了系统性的社会流动研究。索罗金认为社会流动是指“个人或社会对象或价值——

被人类活动创造的或修改的任何变化——从一个社会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任何转变”（Sorokin, 2005），而流动的方式包括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他提出根据社会分层的特点，社会流动的方式可以分为经济的、政治的、职业的向上和向下流动，而且这三种维度上的流动是最重要的流动类型（Sorokin, 2005）。而对于社会流动的具体形式而言可以有两种路径：社会成员可以由一个较低的社会阶层流动到较高的阶层；或者众多的社会成员组成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而且这个新群体整体上进入一个较高的社会阶层，而进入的结果有两种，即“取代这个阶层的原有的群体或者成为与这个阶层的原有群体相平行的群体”（Sorokin, 2005）。与此相应，向下流动也有同样的两种路径，以个体身份的流动，或者以社会群体成员的身份跟随整个群体流动，而这种整体流动的后果也有两种，一种是社会群体的位置整体性降低，另一种是这个群体由此解体不复存在（Sorokin, 2005）。此外，索罗金还根据流动的强度和数量将社会分为封闭性社会和开放性社会；根据垂直流动中遇到的障碍类型及障碍强度，将垂直流动的规则分为先赋性的和后致性的；根据他当时所处的西方社会的现实，认为社会流动主要体现在职业位置上的变化，并由此展开对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的讨论。索罗金对于社会流动研究的贡献是开创性的，他的研究和讨论涉及这个领域中的方方面面，他对社会流动的定义及其各种形式、方式的论述已经成为社会流动研究领域的共识和基础。

（二）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流动

索罗金对社会流动的研究可以说是无所不包，而且他主要是在研究议题上给出了全景式的说明，他之后的学者更多的是就某一具体问题深入研究，而且不同于他侧重于理论说明，以后的社会流动研究越来越倾向于经验研究。利普塞特和本迪克斯（Lipset & Bendix, 1959）及其合作者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社会流动研究的新趋势。他们使用二手数据为人们展现了 20 世纪 50 年代西方工业社会（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工业国家）中社会流动的图景。他们通过研究对当时广泛接受的一般规则进行了验证：①欧洲的社会流动要比美国少；②当工业社会趋于成熟时，社会流动也倾向于下降；③在成熟的产业化背景下，成为商业精英的机会越来越受到限制（Lipset & Bendix, 1959）。

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在西方工业社会中展开的，其主要目的是要考察工业化



社会变迁同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他们发现,社会流动同城市化、工业化和阶层化等过程有关系,而且现代西方社会结构的一些主要过程对社会流动率有直接影响,这些主要过程是:①可获得的空缺职位数量上的变化;②不同的生育率;③与职业相对应的声望排序的变化;④可继承的身份——地位的数量变化;⑤关于潜在机会的法律限制的变化(Lipset, S. M., Bendix, R. & Zetterberg, H. I., 2005)。

在其一系列著作中^①,他们展现了社会流动研究的规范、步骤及初步分析技术。他们特别将职业作为社会位置的指标,来研究受访者的职业流动,他们使用流动表分析方法,考察了社会成员的职业和出身之间的变换,即代际流动,而对于受访者的代内流动也做了研究。可以说,流动表分析是社会流动研究中的第一代分析技术(Treiman & Ganzeboom, 2000),从此社会流动研究的定量分析技术愈发精细和高级。在索罗金的基础上,他们设定了社会流动研究的四个主要方面:①对个体流动历程的研究,主要涉及初始地位和目前地位之间的关系;②对先赋继承与流动方式之间的研究,这里主要涉及出身背景对教育水平和技能获得之间的关系,而研究者将教育水平和所获得的技能视为流动的中介;③流动过程的分析,这是在第一类研究基础上,全面考察个人的工作史;④对社会流动结果的研究(Lipset & Bendix, 1959)。基于对这四个方面的系统研究,他们发现“与城市化和移民相关的过程是社会流动的主要源头”(许欣欣, 2000)。而其研究的最终结论则是“社会流动是工业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而且是连续不断的一个方面”(Lipset & Bendix, 1959)。

他们的研究内容较为广泛,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但是有必要对其中一个内容进行评述,那就是移民对社会流动的影响。确切地说,他们并没有直接详细论述移民对流动的影响,只是分析了移民与美国社会的平等主义理念的关系。正是由于国外移民以及美国其他地区的国内移民从事了低层的职业,才导致了大部分美国人的向上流动,而其中又属国外移民的贡献和牺牲最大(Lipset & Bendix, 1959)。

① 他们二人同其他合作者的主要研究除了发表在一些学术杂志上之外,后期二人将其一系列的研究都编入了 Lipset, S. M., Bendix, R., 1959.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三）社会流动与职业地位获得过程

利普塞特和本迪克斯曾经指出社会流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考察个人的流动过程，而由布劳和邓肯开启的职业地位获得研究则成为社会流动研究中新视角。在《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他们阐述了一个观点作为他们这项研究的前提假设，他们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一个人的职业在其生涯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而且职业结构成为社会分层系统的基础（Blau & Duncan, 1967），这样，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可以通过个体的职业得到体现，因此对于社会流动的研究完全可以落脚在对职业流动的考察上。他们认为在任何一个中等规模的复杂社会中，导致社会流动从而引起社会分层变动的规则包括先赋性原则和自致性原则，也就是说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得一方面受到个人的能力以及实际努力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与其出生和养育背景有关因素的影响，而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自致性原则是更为基本的原则。

他们的实证研究包括个体职业的代内流动以及代际流动，他们在其研究中不但重复了流动表分析技术，而且作为一种研究方式的开创，他们提出了地位获得模型。这个模型的两个主要示范意义在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概念的提出以及路径分析技术的应用。在这之前的职业流动研究中，职业只是被当作类型化的分析对象，因此基于交互分类分析技术的流动表是主要的分析方法，而布劳和邓肯则提出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这个新的分析概念，他们通过回归方法得到了每个职业中基于教育程度和收入所获得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这样他们就提升了职业的测量层次，而且内涵更为丰富，这也为其他统计分析方法的使用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借助于路径分析，他们考察了个体在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与其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在一个基本模型中，他们考察了受访者父亲的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地位、受访者的教育程度、受访者初职地位以及现职地位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这种路径分析的一个重要特征或说假设就是“被看作某些先前因素的结果的变量，反过来可以作为后续变量的原因”（Blau, P. M., Duncan, O. D., & Tyree, A., 2005），也就是将个体的社会生命周期的不同事件区分为前期事件和后续事件，然后考察前者对后者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他们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美国男性的社会经济



地位获得主要受到自身教育和其初职的影响,而父亲的职业等先赋性因素则通过对受访者教育这个中间因素间接地影响其现在的社会经济地位。

(四) 社会流动中的新结构主义

1.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布劳和邓肯的研究模式和方式流行了很长时间,学者们对其研究的模仿和验证强化了地位获得在社会流动研究中重要模式的地位,但是由于地位获得着眼于个体,特别强调个体因素以及家庭背景因素的作用,而且这种地位获得的研究模式暗示着社会结构的稳定,在稳定的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自致性或先赋性因素进入到职业序列,这样一来结构性的因素就完全被忽略了。在越来越多的批评声中,作为对这种研究模式的一个挑战,社会流动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的声音——新结构主义。

新结构主义重视结构性的影响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特征对不同类型劳动力的职业流动的影响,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正有此意。在现代劳动经济学诞生之后,一批美国学者继承了古典经济理论中劳动力市场的部分思想,强调制度和社会性因素对劳动报酬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segmented labor markets)理论体系,被称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LMS)。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对工资差异解释的不同看法。最早全面阐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是多林格尔和皮奥雷(Doeringer & Piore, 1971),他们认为可以根据工资、福利和升迁机制的不同特点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或称为初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而且这两个市场之间很少发生人员流动。主要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是稳定的工作、较高的工资、更多的提升机会、舒适的工作环境和更稳定的工作模式,工作规则的处理是公平的和有适当程序的。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工资一般较低、工作环境差、几乎没有提升机会、就业也不稳定,而且工作是由那些受到歧视的工人所从事的。这种强调工作本身差异对于员工收入的影响被称为新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者坚持认为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性与不完全性竞争是持久的、严重的,它本身就是劳动力市场既存的根本属性,那种把劳动力市场看作是平衡的以及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假设过于天真无知了(Kalleberg & Sorensen, 1979)。

2. 职业空缺竞争理论

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出现以前,关于个人职业获得和流动的研究在视角上都是从劳动力个体的角度展开的,正如布劳和邓肯的职业地位获得研究所展示的那样,个体只是依据个人的能力、素质以及家庭背景因素被选入不同的职业地位。而新结构主义的出现则指出了结构性,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因为现代人的社会地位主要表现于他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研究视角的拓展,学者们发现个体进入某个职业不单是个体性因素或结构性因素的单方面影响,而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索伦逊等人的研究正是提出这样一个理论设想。他们认为,从逻辑上来说,一个人获得某个工作之前,这个工作必须是空缺的,而以此为基础的劳动者和工作匹配过程就是空缺竞争。在空缺竞争过程中,雇主在乎的是雇员个人的特质和生产能力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雇员个人的以往工作经历、教育、性别等先赋因素也会被考虑到,而竞争空缺的人通过这样一些条件被雇主进行排队,那个排名靠前的人自然成为这个空缺的最优人选。而在进入这个工作以后,晋升机会的出现和个人生产能力的任何改变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恰好反映了工作特质的变化以及内部劳动力市场这类结构性的影响(Sorensen & Kalleberg, 2005)。

(五) 社会流动中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

当学者开始运用综合的框架去捕捉和描述社会流动的图景时,个体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结合以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形式出现了。林南(2005)提出“地位获得可以被理解为个体流动和投入资源以获得社会经济中位置回报的过程”。也就是说可以将社会流动视为获得更多或更少资源的过程,同时又可以通过凭借这些资源去获得更好的社会位置。这里的资源可以分为两种: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个人资源被个人所拥有,它可以被个人自由地使用和支配;而社会资源是人们可以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联带来接近的资源。通常个人的一个朋友的职业位置或权威地位,或者该朋友的朋友的这些位置,可以构成这个人的社会资源,而这种社会资源可以帮助个人实现职业的流动、晋升,甚至找到一个新的工作。社会网络观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社会流动研究中方法论个体主义视角的拓展,从而更切合实际地考察社会个体如何在结构性的约束中,“为实现其表现性和建构性目的而采取行动”(林南, 2005)。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者之所以在晋升和收入上有所差异,主要原因是个人的能力差异,这种解释被新古典经济学视为一种合理的过程。但是社会学家认为,如果没有社会资本的际遇作用,人力资本是没有发挥作用的机会的。“社会资本是对人力资本的背景性关系的补充”(Burt, 2005)。这也就是说,只有当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以及其他类似的层级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时,他才能够发挥自身人力资本的最大效用,从而获取尽可能多的回报。

(六) 职业机会的逻辑和结构

学者们明白,只有以一种更均衡的视角来考察社会流动才能更加准确和完整地把握流动的模式和规律,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解释可以视为其中的一种努力,而职业空缺竞争理论则更加清楚地将个体因素和结构因素结合起来。作为这种结合的努力,特别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的出现,职业机会成为社会流动研究中的新的着眼点,它将流动的个体和更大的社会结构联结起来,以此来发现哪些群体获得了更多、更好的职业机会,这些群体的特征是什么。斯科夫沃雷茨澄清了机会和流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机会差异产生的方式主要有位置的、历史的、资源差异三种可能。而不同方式产生的机会差异同社会流动数量的差异之间有不同的逻辑。由此他提出由个体组成的不同的群体在职业流动上的差异都可以通过机会的差异得以解释,而个体在分层系统中的移动就要视该分层系统所提供的移动机会而定(Skvoretz, 1984)。在不同的分层系统中,有些类型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的机会较多,那么流动的可能性也就大;而机会较少时,被预期的流动也会变少。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群体面临着不同的职业机会,对应于群体在分层系统中的位置,这种机会也被结构化了。罗根(Logan, 1996)认为雇佣结果依赖于机会和选择,而这二者又都受制于结构的影响。他通过使用新的统计技术双边对数模型(two-sided logit)构造了一个关于机会和选择的函数,而这个函数则是雇主和雇员的表现和资源的表达。他通过数据拟合发现为获取不同类别的职业的雇佣机会,雇员在教育、种族以及年龄等特质上的重要性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布罗斯菲尔德(Blossfeld, 1986)的考察则侧重于结构的变动性,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依据时间变迁对职业流动的影响,他使用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时间序列指标来反映调查时点的结构性因素,这样个体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就可以被综合考虑到。他通过研究还发现,职业获得过程受到生

命历程、同期群以及时期的三重影响，也就是说个体的流动结果依赖于劳动力寿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以及真实的历史时间。

二、国内研究

对西方经典研究的回顾基本上是以流派罗列的形式展现了社会流动研究中的发展过程和传统，其中既包括流动的理论，也包括不同流派的具体分析方法和技术。而在接下来的部分中，笔者将回顾那些和本主题有关的研究，对于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流动的研究有必要限制时间跨度，而这个跨度的界定主要依据观察时间，有时为了展现过程变化和比较差异的需要，笔者会适当涉及那些对 1949 至 1978 年间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

（一）身份与政治流动

关于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流动，帕金（1969）曾经指出要注意对两个不同的时期进行区分：一个是政权建立初期，另一个则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因为执政党在这两个时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而这对人们的社会流动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建政初期，新生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从整体上消灭了以前阶级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某些群体，如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等。另一方面，新政权采取措施促进社会平等，主要是改善先前占不利地位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金涛（2008）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正是政权建立初期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他以 1949—1952 年的扬州市为例，他发现政权建立初期需要对政权组织及党群组织进行重新厘定，这个过程也是政治阶层发生较大变动的过程。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国家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对社会各阶层重新排位，数量众多的下降性流动在这个时候开始显现。而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人等主要无产阶级的的重要性上升，在社会流动上表现为向上的跃迁。此外，比较有启发意义的是，他认为在建政初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所规定的参与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社会阶层发生流动的内在机理。李学林和张晓丹（2006）的研究则从毛泽东的建国思想中总结影响社会流动的政策背景。为了巩固新政权以及维护合法性的需要，毛泽东着力培育新的政治精英，其中主要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作为新政权的阶级基础，采取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等政治经济政策，因此导致了